

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



K926.57/1

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

韩 振 华 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20425

中 华 书 局

1981年·北京



820425

内 部 发 行

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

韩 振 华 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7 1/2。印张·171千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册

统一书号: 11018·948 定价: 0.85元



前 言

包括今天的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在内的我国南海诸岛,其见于中外历史记载者,大都比较零碎和混杂。当前,在着手整理历代南海诸岛资料的时候,探讨和澄清南海诸岛历史地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是一件有着重要意义的工作。

这本《论集》共收文章十篇,都是选自参加1979年11月在福建厦门举行的“南海诸岛问题科学讨论会”的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部分论文。其中有些文章,彼此看法还不一致。现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将它们辑在一起,以供进一步研究、探讨。

编者 1980年8月

目 录

前言

七洲洋考(谭其骧)·····	1
附:夏鼐致谭其骧函(节录)·····	7
宋端宗到过的“七州洋”考(谭其骧)·····	9
附:夏鼐与谭其骧通讯四函(节录)·····	12
七州洋考(韩振华)·····	21
宋端宗与七洲洋(韩振华)·····	63
元代“四海测验”中的中国疆宇之南海(韩振华)·····	87
石塘长沙资料辑录考释(林金枝)·····	118
石塘长沙考(文焕然 钮仲勋)·····	149
十六世纪前期葡萄牙记载上有关西沙群岛归属中国的几条资 料考订(韩振华)·····	161
附:干豆考·····	167
古“帕拉塞尔”考(其一)·····	173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外国记载上的帕拉塞尔不 是我国的西沙群岛(韩振华)	
古“帕拉塞尔”考(其二)·····	206
——十六、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外国地图上的帕拉 塞尔不是我国的西沙群岛(韩振华)	
附图: 1. 我国南海诸岛图	
2. 约翰·沙利《航海记》(1613)中地图	

七洲洋考

谭其骧

认为我国旧籍中的七洲洋就是今之西沙群岛，这个说法据我所知，始于一九〇五年法人夏之时所著《中国坤輿详志》；七十多年来，影响很大。外国汉学家如伯希和、藤田丰八等，我国治西域南海史地学者如冯承钧、向达^①等，以至解放前后所有涉及南海诸岛历史的报刊文章，都沿袭了这种说法。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时至今日，认真整理南海诸岛的历史已为我历史学界一项迫切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我们不能容许错误的说法再广为传播下去了。因此，写这篇短文澄清一下这个问题看来是十分必要的。

(一)

宋元明记载中，七洲洋皆指今七洲列岛附近海面。

七洲洋始见于南宋人著作《梦梁录》，宋代只此一条^②。在元代文献中凡三见：《元史·史弼传》、《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明初郑和下西洋时载及七洲洋的则有《星槎胜览》。今将这些早期记载摘录如下：

吴自牧《梦梁录》：“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迤迤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海洋近山礁，则水浅，撞礁必坏船。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仑。’……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

《元史·史弼传》：“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弼以五千人，合诸军，发泉州，……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入混沌大洋，……”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

汪大渊《岛夷志略》：“昆仑山，……下有昆仑洋，因是名也，船贩西洋者必掠之，顺风七昼夜可渡。谚云：上有七州，下有昆仑，计（针）迷舵失，（人）舟就（孰）存。”

费信《星槎胜览》：“昆仑山，其山节然瀛海之中，……俗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

上引五条记载中的七洲洋，很清楚指的都是今海南岛文昌县东七洲列岛附近的海面，不可能指西沙群岛的海面，更不可能指西沙群岛。试论证如左：

一、七洲洋水深七十余丈，约为二百余公尺，与今地图七洲列岛附近海深线在五十至二百公尺之间大致相符。西沙群岛附近洋面深度为一千公尺左右，与“七十余丈”不符。若岛屿附近水浅处，则有撞礁之险，非海舟停泊处。

二、史弼用兵爪哇，先经万里石塘，然后历交趾占城界，可见此万里石塘应指今西沙群岛；叙七洲洋又在万里石塘之前，可见应指今海南岛东侧海面。若七洲洋即万里石塘之海面，则史文无需复出万里石塘四字。

三、周达观行程历闽广诸港口以后，过七洲洋，在经交趾洋到占城之前。按：占城在今越南中部，交趾洋指自海南岛西南至占城海面；则七洲洋自应指交趾洋北之海南岛东侧，不可能反指在交趾洋东南的西沙群岛海面。

四、《梦梁录》、《岛夷志略》、《星槎胜览》三书中七洲皆与昆仑对举，昆仑洋指昆仑山下即昆仑岛下的洋面，则七洲洋自应指七洲

山即七洲列岛下之洋面。宋元以来，皆称西沙群岛为石塘、长沙、千里或万里石塘、千里或万里长沙，无称七洲者，可见七洲洋应指七洲附近的洋面，不可能指石塘或长沙的洋面。

西沙群岛由三十多个岛、礁、滩、沙组成，其中较显著的亦达十五个，决不止七数。惟整个群岛又可分成东西两部分：永乐群岛在西，较显著者八岛，俗称下八岛或西八岛；宣德群岛在东，较显著者七岛，俗称上七岛或东七岛，渔民也有称之为七洲的。《中国坤輿详志》之所以以西沙群岛当古籍中的七洲洋，当由于此。但宣德群岛可以叫七洲，整个西沙群岛不能叫七洲；且宣德有七洲之称不见于古籍，古籍中七洲皆明指文昌县东的七洲列岛。夏之时显然是犯了以偏概全，混淆古今的错误。

五、诸书屡及七洲、昆仑，这是由于此二处为当时往返闽粤与南海诸国间航道所必经。既为航道所必经而又有险，故有去怕，回怕，上怕，下怕之谚。若万里石塘则“避之则吉，遇之则凶”（《岛夷志略》），岂得为航道所经？至七洲洋之所以可怕，则端在舟过此处时若掌握南针“少差”，便会碰上万里石塘，“针迷舵失，人船莫存”。昆仑洋之可怕，亦当在航线若偏东，即有触及南沙群岛的危险。

七洲、昆仑都是有相当高度的岩岛，“节然瀛海之中”，因而得与明清针经中的乌猪、独猪、外罗、占笔罗等山并列，成为指引海道航向的指标。至于西沙、南沙诸岛，都是些海拔很低而礁盘很大的珊瑚洲，远处看不见，等到船至近处看得见了，便有触礁之险，怎得成为大海中的航标？

郑和下西洋以后，正统六年（一四四一年）行人吴惠奉命出使占城册封嗣王，是明朝官员航行南海的又一大事。传世明代著作如慎懋赏《海国广记》、王鏊《守溪长语》、《震泽纪闻》、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黄佐《广东通志》等，皆载及此事。诸书所载吴惠的航程都是发东莞县，次日过乌猪洋（今下川岛附近），又次日过七洲洋，

铜鼓山，又次日瞭见大周山（二山都在海南岛东岸），又次日至交趾洋。可见所谓七洲洋只能是指海南岛东北的七洲列岛附近。

明代中晚期有三部讲海道交通的专书，都提到了七洲洋：《海语》、《顺风相送》、《东西洋考》。

《顺风相送》共八次提到七洲洋，有地望可指者凡五处：（一）“定潮水消长时候”条说：船过七洲洋，贪东七更见万里石塘。可见七洲洋不等于万里石塘的洋面，后者在前者之东七更路程，后者即今西沙群岛，则前者无疑指七洲列岛附近洋面。（二）“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条系七洲山七洲洋于乌猪山之下，独猪山之上。（三）“浯屿往大泥、吉兰丹”；（四）“太武往彭场针路”；（五）“广东往磨六甲针”。三条都说七洲洋在乌猪山西南，又西南为独猪山。可见七洲洋专指七洲山附近，西南不超过今万宁县的独猪山即大周山或大洲头。

张燮《东西洋考》中载及七洲洋一段最为详晰：

“乌猪山”：注云“用单申针十三更，取七洲山”。

“七洲山、七洲洋”：注引《琼州志》：“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冽可食。”又注曰：“俗传古是七洲，沉而成海。舶过，用牲粥祭海厉，不则为祟。舟过此极险，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即《琼志》所谓万州东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脱者。”

这里和上引《顺风相送》“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条都将七洲洋系于七洲山之下，可见七洲洋自应指七洲山下的洋面。这里虽未引“去怕七洲”这一古语，但很具体地说到了“舟过此极险”，险在于“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舟犯石塘希脱者”，这是对“去怕七洲”的很好的解释。由此可见七洲之可怕不在于七洲洋本身，而在于掌握针向偏东时便有撞到万里石塘即西沙群岛上去的危险。再者，这里又明确指出万里石塘所在的海面名为石塘海，它是在万州之东，而七洲洋则在万州之北。

《顺风相送》载七洲洋“一百二十托水”。《东西洋考》载七洲洋“打水一百三十托”。每托约合五尺，一百二十托，与《梦梁录》所载七洲洋水深约七十余丈基本符合。

明代记南海三书中，惟独黄衷《海语》在暹罗条下有云：“自东莞之南亭门放洋，南至乌猪、独猪、七洲”，原注：“三洋名”。七洲洋既列于万州独猪洋之后，似应在独猪洋之南，接近西沙群岛。但从明代其他诸书全都列七洲洋于独猪山之前看来，《海语》此条显然是颠倒了次序。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其他多数记载都错了，反而这条七洲在独猪之南的孤证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足证明以前文献记载中的七洲洋，指的都是仅限于今海南岛东侧七洲列岛附近的洋面。

（二）

清代图籍中的七洲洋，有广狭二义：狭义沿袭明以前旧义；广义则范围极广，包括西沙群岛海面在内，但亦不专指西沙群岛海面。

狭义的如约成书于十八世纪初的针经《指南正法》，书中凡十一处提到七洲洋。其中有些条文内容基本上与《顺风相送》相同，不赘叙。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另有一条自宁登洋（即广州伶仃洋）往高州的航线，一条自大担（即金门大担岛）往交趾（指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航线，一条自宁波往东京（指越南河内）的航线，这三者都经过七洲洋。试问七洲洋若指西沙群岛洋面，这三条航线怎么可能会绕道经过这个洋面？当然只能是指七洲列岛附近才能解释得通。

又如《泉州府志》、《同安县志》中关于十八世纪初广东水师副将吴升巡视琼州府海域的记载，都说是“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铜鼓山七洲洋在海南岛东侧，四更沙在

海南岛西昌化县境，这条巡视路线显然是从琼州府治附近出发顺时针方向，自北而南，自东而西，又自南而北，自西而东，绕岛一周，与三千里之数基本符合。若说是南下巡视到了西沙群岛，再折而西北绕经四更沙东返琼州，那就不止三千里了。何况这条记载的目的是在宣扬吴升不畏艰险，躬自巡视，若果真到了西沙群岛海面，岂有不提远处的石塘或长沙，只提近处的铜鼓山、四更沙之理？

又如记录十八世纪后期航海经历的谢清高《海录》有云：“自万山始，既出口，西南行过七洲洋，有七洲浮海面故名，又行经陵水，……”这个七洲洋也很清楚指的是陵水以北七洲列岛附近海面。

舆图中如嘉庆二十二年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明清档案馆藏），也把七洲洋注在海南岛以东，万里长沙以北。直到宣统元年的《广东舆地全图》，七洲洋也注在七洲之南，铜鼓嘴之北。

广义的七洲洋始见于十八世纪初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此书在“南洋记”一节中，说七洲洋在“大洲头而外”，又说自北而南，过了“琼之大洲头”才过七洲洋，可见它所指的七洲洋，已确从明以前的旧义指大洲头以北，改为移而指大洲头以南。但是不是指的就是西沙群岛的海面呢？也不是。同书在“南澳气”一节中又说万里长沙（西沙、中沙二群岛）之南为七洲洋，更南为千里石塘（南沙群岛）；在“昆仑”一节中又说七洲洋南境直抵大小昆仑山。可见此书所谓七洲洋，范围极广，北起海南岛东南隅大洲头，南抵越南南北纬八度多的昆仑山，都包括在内。这个“七洲洋”是包括西沙群岛海面在内的，但并不专指西沙群岛海面。

这种广义的用法，又见于道光壬寅刻本《海录》卷首的地图中，七洲洋三字拉长注于海南岛与昆仑山之间，长沙、石塘皆在其东。这幅图一般为丛书本《海录》所无，疑非《海录》所原有，而系道光壬寅刻本刻书者录自他书，故七洲洋的含义与《海录》书中用法不同。

又见于十九世纪中叶徐继畲《瀛环志略》的《南洋滨海各国图》和《南洋各岛图》中，七洲洋三字注于琼州昆仑之间，长沙、石塘之西南。又见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郭嵩焘《使西纪程》，中有云：“……在赤道北一十三度，过瓦蕾拉山，安南东南境也，海名七洲洋”，在北纬十三度瓦列刺岬以外的海面还叫七洲洋，可见这个七洲洋是伸展到西沙群岛以南的洋面的，与《海国闻见录》相同。

如上所述，则七洲洋的广狭二义，在有清一代都是长期通用的。

总之，不论是明以前的七洲洋旧义也好，清代的七洲洋广狭二义也好，七洲洋都不指或不专指西沙群岛洋面，更不等于就是西沙群岛。西沙群岛在旧籍中只作石塘、长沙或万里千里石塘长沙等，从来没有被称为七洲；西沙群岛海面的专称只有见于《东西洋考》的石塘海，从没有被称为七洲洋。

注释：

① 伯希和《真腊风土记》注；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注；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译丛》；向达《两种海道经》。

② 《宋史·二王本纪》载元将刘深迫宋端宗至七洲洋，《宋史纪事本末》作七里洋。两个“七”字都是“九”字之误。“里”字则系“星”字之误。九星洋一名九洲洋，在今珠海县九澳岛稍北。另有考。

附：夏鼐致谭其骧函（节录）

季龙同志：

在京时承蒙见告有大作一篇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发表。最近抽空拜读一过，引证渊博，立论谨严，敬佩，敬佩！宋、元、明记载中之七洲洋皆指今七洲列岛附近海面，可作为定论。大作应在公开刊物中发表，以纠正一些人的错误。

惟文中谓“这个说法（指以七洲洋为西沙群岛）据我所知，始于1905年法人夏之时所著《中国坤輿详志》”。实则此说提出之时间

更早。文中又以为伯希和“沿袭了这种说法”，引伯氏《真腊风土记笺注》为证。伯氏此书有冯承钧译本，原发表于1902年之《法国远东学校校刊》第二期，岂能以1902年之文沿袭1905年之著作中所提之说法？实则据伯氏自云，在伯氏之前，迈厄斯(Mayers)于《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三期(1874年)中，格伦末德(W. P. Groeneveldt)于《关于印度支那论文集》第二辑第一册151页中，夏德(F. Hirth)于1894年《通报》第五卷(388页)中，均曾误以七洲洋指西沙群岛(Paracels)。

又伯氏此本《笺注》，有增订本，在其死后作为遗著于1951年出版，增订本已改正错误，已改以七洲洋为七洲列岛(Taya Is.)附近海面，据云：1904年即已发现此误(86—94页)，伯氏所引之史料，与大作中所列者，有同有不同，而结论则完全一致，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大作注语中谓“《宋史·二王本纪》载元将刘深追宋端宗至七洲洋，《宋史纪事本末》作七里洋。两个‘七’字都是‘九’字之误，‘里’字则系‘星’字之误。九星洋一名九洲洋，在今珠海县九澳岛稍北，另有考。”不知此考已杀青否？亟欲先睹为快。里为星之误，似无疑问，但二“七”字是否都是九字之误，尚可商榷。查《元文类》卷四十一引《经世大典》亦谓俞如珪被执处在七洲洋，岂此“七”字亦为“九”字之误？《正德琼台志》卷五，谓“七洲洋山在〔文昌〕县东大海中，……一名七星山”。若然，则由七洲山得名之七洲洋亦可称七星洋。此次海战之处，史文未明言距秀山、井澳之远近，既可在九洲洋，亦可在七洲洋。增改文字解经，经师所忌，质之高明，以为如何？

顺颂

著安

夏鼐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宋端宗到过的“七州洋”考

谭其骧

《宋史·二王本纪》载景炎元年(一二七六)十一月乙巳端宗自福州入海,自此假息闽粤海上,屡移驻所;至次年“十二月丙子,昀(端宗)至井澳。飓风坏舟,几溺死,遂成疾。旬余,诸兵士始稍稍来集,死者十四五。丁丑,刘深追昀至七州洋,执俞如珪以归。”

按井澳在珠江口西侧澳门之南横琴山下^①,一般宋元明记载如《梦粱录》、《真腊风土记》中之七洲洋,皆指海南岛文昌县东七洲列岛附近洋面^②。《顺风相送》广东往磨六甲针:“南亭门放洋,用坤未针五更船取乌猪山,用单坤十三更取七洲洋。”南亭门位于珠江口万山群岛间,与井澳相近。一更合六十里,十八更合一千另八十里,与今图所载海道里程大致相符。七洲洋去井澳既有千里之遥,宋端宗以十二月丙子(廿二日)方至井澳,焉得次日丁丑已在千里外之七洲洋^③?此一可疑也。此前端宗自福州奔泉州,移潮州,次惠州之甲子门,次广州之浅湾^④,又走秀山^⑤,再移井澳,每次移驻,皆不甚远,何以独此次不在珠江口西至雷州湾千里海疆上觅一驻所,遽尔远走海南?此二可疑也。《宋史纪事本末》记此事作:“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飓风大作,舟败几溺。帝惊悸成疾。旬余,诸兵士稍集,死者过半。元刘深袭井澳,帝奔谢女峡,复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七里洋”应即《二王本纪》之七州洋。谢女峡当为自井澳趋大陆之道,故下文曰“复入海至七里洋”,则此洋当在大陆海岸附近处。若自井澳趋海南岛东北之七洲洋,则两处俱在海上,何需登陆“复入海”耶?此三可疑也。有此三可疑,故

知宋端宗亡命所至之七州洋。应去井澳不远，必不得为见于《梦梁录》、《真腊风土记》等记载中之七洲洋。

今按《方輿纪要》广州府香山县下有九星洋，“在县西(当作东)南，建(当作景)炎二年元将刘深袭井澳，帝至谢女峡，复入海至九星洋，欲往占城不果。”香山县之九星洋，《清一统志》广州府山川望门山条下作“九星大洋”，《纪要》广东海、《清一统志》广州府海皆作九星洋，同治《广东图》亦作九星洋，光绪《广东舆地全图》作九洲洋。《纪要》引《一统志》：“海中有九曜山，罗列如九星，洋因以名。”《清一统志》：“九星洲山九峰分峙，有水甘美，曰天塘水，海舶往来所汲。”据图，九星洲及九洲洋位于香山县（今中山县）东南吉大汛东，距岸不足十里，西南去澳门十余里，南距横琴岛东之九澳岛二十余里^⑥，自井澳至此，渡海登陆，复自陆入海，相去不过四五十里，一日可达。然则史载宋端宗亡命海上所经之“七洲洋”，应即指此。此洋本作九星洋或九洲洋，史文二“七”字皆“九”字之误，“里”字则“星”字之误也。

以上是我在五六年前所写的一条读史札记（附注系近日所增补）。一九七七年写《七洲洋考》时，考虑到这个宋端宗流亡时到过的“七洲洋”既然是九洲洋之误，便不应作为七洲洋的宋代资料写入正文，只能在注中交代一下；但札记全文太长，因而仅将结论入注，缀以“另有考”三字。顷承夏鼐同志移书商榷，指出《元文类》卷四十一引《经世大典》亦谓俞如珪被执处在七洲洋，所以他认为史载残宋与元军海战处作七洲洋或七里洋，“里”为“星”之误似无疑问，二“七”字则未必为“九”字之误。也就是说，这个战场既可在香山县之九洲洋，亦可在文昌县之七洲洋。从信里的语气看来，夏鼐同志是倾向于认为应在七洲洋的。接信后赶紧把《元文类》找出来一看，所引《经世大典》记载此事的原文是：“十二月二十三日，

……追昱、昺、世杰等至广州七洲洋及之，战海洋中，夺船二百艘，获星母舅俞如珪等”。一看使我不胜欣喜，这决不是一条否决我的看法的资料，相反倒是一条很好的证实我的看法的资料。因为今海南岛文昌县东的七洲洋，在宋代应属琼州，去广州甚远，中隔雷、化、高、南恩诸州海面，断不得悬属于广州；而在广州境内有所谓“七洲洋”，便只能是指今之九洲洋。

至于《东西洋考》七州山、七州洋条引《琼州志》：“元兵刘深追宋端宗执其亲属俞廷珪之地也”，这是不足信据的。这显然是因《经世大典》、《宋史》等史籍都说元军追宋端宗及于“七洲洋”，而七洲洋实在琼州海域，修地方志的便不问情实，硬把这一故事拉到了琼州海域上来。

琼州的地方志认为宋端宗到过的是琼州的七州洋，而广州的地方志则认为宋端宗到过的是广州香山县的九洲洋或九星洋。核以史实，端宗十二月丙子尚在井澳，丁丑不可能远走至琼州七洲洋，所以广州的地方志应该是可信的。问题是：《经世大典》、《宋史》、《宋史纪事本末》中的“七州洋”，“七”字是不是错字？我查了道光《香山县志》，作者认为端宗所到的“七州洋即今所称九州洋”（卷八事略）。这是说，文献记载作七州洋并没有错，而是古今地名发生了变化。这是可能的。很可能在宋明之间，这一海域的海底在上升，原来的七洲变成了九洲，人们也就改称洲为九星洲，洋为九洲洋或九星洋。不过“七”字是“九”字之错这种可能性似乎也还不能完全排除。文献记载往往辗转传抄，一种错了几种跟着错，这并不可怪。上文引《方輿纪要》香山县九星洋条，中有“复入海至九星洋”一语，这条记载不像出自顾祖禹自撰，像是从宋元记载上引录下来的。若然，则宋元记载中洋名首字也有作“九”的，不一定作“七”。

总之，宋端宗流亡海上所到过的“七州洋”，只能是珠江口内澳

门东北今之九洲洋，不可能是海南岛东北七洲列岛下的七洲洋。今人又或误以西沙群岛为古七洲洋，从而又有宋端宗避元兵曾驻蹕西沙群岛之说，那就更是齐东野人之语了。《宋史纪事本末》载：端宗以舟师发福州入海之初，“时军十七万人，民兵三十万人”；帝昺驻厓山，“时官民兵尚二十余万”；及厓山败亡，“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扈从端宗的是一支十余万乃至数十万人的队伍，所以辗转海上，所有驻蹕之所，都是在大陆海滨港澳里或近岸岛屿上，这样才可以依靠大陆近处资粮，以供给养。西沙群岛是几个无粮的珊瑚洲，远离大陆近则三四日程，远至七八日程，残宋大军跑到这里来屯驻，那岂不是自投绝地？此事理所必无者也。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四日

注释：

① 见《方輿纪要》广州府香山县井澳条、《清一统志》广州府山川横琴山条、《图书集成·职方典》广州府山川深井山条。清图作深井，今图亦作深井，西濒海湾曰深井湾。

② 见拙撰《七洲洋考》。

③ 端宗以丙子日至井澳遇飓风，《宋史》及《宋史纪事本末》、《厓山集》、嘉靖《广东通志》所载皆同。《厓山集》引《填海录》、《图书集成》引《香山县志》作丙寅（十二日），不可从。盖由史文丙子下有旬余云云，遂疑丙子为丙寅之误而擅改之耳，非别有所本。

④ 《二王本纪》见至元十四年九月戊申至十一月庚寅端宗驻蹕浅湾，《宋史纪事本末》作是年九月戊申“帝舟次广之浅湾”。

⑤ 即今东莞县西南虎门西岸大小虎山，见《方輿纪要》东莞县虎头山、《清一统志》广州府山川秀山。

⑥ 一九六三年广东省测绘管理局出版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亦作九洲洋，在珠海县（香洲）东南，澳门东北。

附：夏鼐与谭其骧通信四函（节录）

一、夏鼐致谭其骧函

季龙同志：

《宋端宗到过的“七州洋”考》提纲，已拜读一过，足见读书细